

为改革开放尽心竭力,值!

迟福林

治经济学理论。在学习研究中,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严谨治学对我影响深远。比如,王珏教授关于商品经济、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理论研究,都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在中央党校积极组织开展相关的讲座和改革研讨。

二、为改革开放事业不懈研究

自1984年开始从事改革研究,至今已近38个年头,我在研究中先后提出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线的主线的二次转型与改革、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从“一次开放”到“二次开放”、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多项改革政策建议。某些建议或直接向中央决策采纳,或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规的参考材料。这里,也举几个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往事。

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期出现了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的激烈争论,不少农民对土地承包制忧心忡忡。从建院开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就把农村改革作为重点研究课题,并成立了农村改革研讨小组,我带队深入农村田间地头调查。1995年,我们提出“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建议(60条)”,并主持研究“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提交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题的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该建议报告被用作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的参阅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决定”原文采用。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2003年SARS危机期间,率先提出政府转型的改革建议,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003年7月12日,我在北京主持了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改革座谈会。我强调政府是经济建设环境的创造者,是公平竞争的维护者,需要转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当年,牵头主笔提出“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若干建议(24条)”,这一建议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这以后的几年,中改院相继提出“政府转型”一系列政策建议,受到中央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对政策决策与理论研究产生某些积极影响。

三、痴心天涯热土的改革实践

1987年底,在党中央创办海南经济特区战略构想感召下,我作为第一个从中央机关下派到海南的干部,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踏上海南这片热土,一待就是35年。刚到海南时,还有人 misunderstanding:“你为什么来海南?”我为什

么来海南?因为海南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既然将改革开放事业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我无怨无悔地选择了海南,并为之呕心沥血、竭尽心智。

参与设计建立海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1987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到海南工作。从1988年到1992年,作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我参与了海南建省初期改革开放的若干政策研究与制定。在这期间,受许士杰书记委托,我主笔了海南第一次党代会报告《大胆发展生产力 开创海南特建设的新局面》,开始进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并且主持海南经济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推动海南经济特区率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提出海南国际旅游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考虑新世纪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并提出从区域开放到产业开放,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新路子。从2000年至2009年的9年间,我带着中改院的研究团队提出并形成国际旅游岛的思路、方案、政策制度安排等建议。2009年,国际旅游岛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

建言海南自由贸易港。1988年,海南提出“特别关税区”,就明确提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实行“货物、资金、人员三大自由”的主张。这与今天的自由贸易港内涵基本一致。我为此呼喊了30余年。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形成百余份研究建议,积极主动地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言献策。2018年4月13日下午,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当听到总书记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时,真的很激动。在会后央视《新闻联播》的采访中,我没想到自己会为此哽咽。

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

我一直认为,人一辈子能赶上两三次重要机遇,能做成一两件重要事情,真的很幸运。这40年,我坚持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改革、参与改革;二是参与创立和主持建设中国改革智库——中改院。31年来,中改院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却积极主动建言改革,坚持做改革研究,因为我们坚定认为,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智库积极咨政建言,需要智库积极开展国际对话交流,凝聚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与合力。

中改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1988年6月,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成立。1990年初,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到海南考察,他找到我,建议把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海南”两个字括起来,成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由国家体改委与海南省联合办,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改革研究和培训基地。1991

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正式成立。

创新软科学机构体制机制,自己改自己。中改院刚刚成立,陈锦华主任就找我谈话,“要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研究智库”。从1992年9月1日开始自筹经费、自负盈亏,我一直在中改院拿工资、交社保。2018年6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对面》的专访中,我谈起中改院建院还不到半年就主动走上企业化管理之路的往事,主持人问我为什么级别也不要,在90年代初就砸掉自己的铁饭碗?我说,就是要使中改院相对独立地研究重大热点问题。如果没有一点追求,依赖“大锅饭”,长此以往肯定做不出大的成绩。很多老领导老专家感慨地说,“中改院就那么几十个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对我国改革始终如一地执着奉献,出了这么多成果,关键是建立了一个好的管理体制和研究机制”,关键是建立了一个“小机构、大网络”的运行机制。

去年,我将中改院30年凝练总结为三句话:“家国情怀、执着精神”是中改院的“魂”;“以改革办法办院”是中改院的“本”;“立足海南”是中改院的“根”。回过头来看,我们深深感到立足国情,在服务党和国家决策中发挥智库的作用和责任,即使再辛苦,也可以说无愧于时代,一个字“值”!

“有价值才会追求,有责任才会坚守”。我将这几十年的改革研究体会浓缩成八个字:“家国情怀、执着精神”。这份事业具有时代价值、历史价值,值得为此不懈努力。

名家小传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等多项荣誉,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多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中英文专著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800余篇,提交大量政策建议报告;率先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等多项改革政策建议,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扫一扫
看视频

长三角智库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协同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型组织模式和创新一体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已然成为推动长三角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关键变量。长三角地区肩负着重要创新策源地的历史使命,理应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桥头堡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军。为此,可以通过聚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协同开放创新发展、创新资源要素共享和科技创新生态优化四个方面,加快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着力打造协同创新的“长三角样本”。

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高地

协同创新是创新主体共同构建协同创新的组织和平台,强调通过分工与协作推动信息、技术、知识等资源要素共享和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加速创新成果的创造、扩散与应用,实现知识增值、产业技术进步和企业竞争力提升。因此,协同创新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成科研与产业的有效衔接,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创新活力强、创新产出效率高的科技型企业已经成为加速科学知识向生产知识转化的推动者。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创业孵化平台,就是以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通过提供创业设施以及创业服务,降低企业的创业风险和成本。因此,长三角应紧密结合数字经济时代创业需求,致力建设一批商业模式创新、运行机制灵活、资源集聚度高的新型孵化器和创业服务平台,促进创业成功项目产业化和新兴产业集群化。

打造协同开放创新发展先行区

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式创新范式已经成为协同创新主体的必然路径选择。对于企业组织而言,需要有很强的资源挖掘和资源整合能力。对于国家或区域而言,利用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集聚、虹吸和配置全球创新要素,构建全球创新链和全球创新网络。开放式创新要在更广泛的创新主体范围内,通过创新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来提升创新效率。长三角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关键在于把握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方向,通过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集聚全球优质人才等创新要素,形成具有引领性、发挥全球经济主导作用的城市群中心。为此,长三角应立足独特区位优势 and 开放发展基础,加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和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充分放大枢纽经济效应,不断加强区域内各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型平台之间的协同与联动,同时促进产城融合,协力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打造创新资源要素共享试验区

协同创新效应发挥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资源要素共享,其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体系、创新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其中,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体系是基础条件,可实现创新资源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最大化,其中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则是保障条件,可以使长期被分割在产业、企业中的经济资源要素与大学、科研机构中的科技资源要素打破组织界限,进行共享、融合与重组。从目前长三角来看,迫切需要以整合共享创新资源要素为切入点,以打造创新资源要素共享试验区为抓手,一方面应着力构建和完善以国家(工程)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为主体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以及为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科技检索、数据标准等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另一方面,应通过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不断完善创新收益分配体制,按照所承担风险比例的不同决定其利益,逐步形成资源共享、风险分担、协同发展的区域产学研创新联盟。

打造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样板区

协同创新,既是微观层面的创新行为,也是中观层面的创新方式,更是宏观层面的一种创新战略。为了避免市场失灵和企业短视行为,需要政府制定和实施创新政策,优化创新生态体系。一项合意的有效的创新政策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政策实施目标上,既强调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也重视共性技术、支撑技术和衍生技术的发展;既强调核心企业的引进和培育,也重视相关配套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引导;既强调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研发创新中的源泉地位,也重视市场中创新中介机构对协同创新的支持。二是在政策实施动力上,既重视推动创新知识的产出、供给和溢出,更注重促进创新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三是在政策实施手段上,应更注重通过创造创新产品需求,提供人才服务、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引导企业创新,并加强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公共性服务,从横向上创造一个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另外,还应重视政策宣传、文化建设,法治完善来营造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意识精神、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加快形成精神激励、财富驱动和法律保护的创新机制。因此,长三角各地应对照上述要求,率先加快传统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和制度供给,努力打造示范引领全国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样板区”。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观点万花筒

后来者优势仍是中国经济最重要引擎

近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后来者优势仍是中国经济最重要引擎。在现阶段,中国应该在用好后来者优势的同时,搞自主研发,两条腿走路。

林毅夫认为,中国现在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发展当然关注全世界的趋势,但是中国的发展本身也对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固然这些年有一些杂音,如逆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些冲击,但全球化还是每个国家最好的选项,因为全球化让每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是每个国家创造就业、提高增长率、促进发展、增进人民幸福最好的方式。

近年来,供应链搬离中国、跟中国脱钩的声音固然不少,但中国的贸易增长和出口增速仍然很快,可见只要是我们保持定力,按照经济的基本规律发展好,就可以给全世界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同时我们发展好了,也可以给全世界提供越来越多高质量、价格合适的产品和服务。其他国家经济要发展好,也必须按照这个原则,所以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进一步分析道,后来者优势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他将中国的产业分为五大类型: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型型产业、换道超车型产业和战略型产业。目前,我国经济从比重看,还是追赶型产业比重最高,85%还是相对传统的、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的产业。他提到,如果到法兰克福工业展上看,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在价格、质量、技术上还有差距,仍然有后来者优势。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用,形成市场与国家功能的有机结合、互补,二者相得益彰,最终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思想人生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近40年参与改革研究,我深切体会到“改革开放决定国家未来”,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需要思想引领,需要理论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需要为推进改革上下求索、长期坚持。40年来,我将主要精力放在改革研究上,围绕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把自身价值与建言改革的时代责任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将战略研究与行动探索相结合,不断服务改革、奉献改革、建言改革。

一、与改革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我,经历了国家经受的“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种种挫折,全过程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巨变,并由此自觉地将改革开放研究作为自己不懈的人生追求。

从参军到担任新闻干事,开始涉猎马列学说。1968年1月,我参军入伍,成为沈阳军区一名外语学员,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军旅生涯。1970年12月,我到部队政治处任新闻宣传干事,并被送到《旅大日报》(现在的《大连日报》)学习半年。从山沟里出来,我开始接触社会、接触新闻。那一期,“文化大革命”浩劫还没有过去,许多积蓄已久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我开始感觉到,国家和社会需要变革。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些问题,我开始读马列书籍。那时候尽管条件很差,可从学习卡片一点点做起。

从国防大学到北京大学,开始对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思考。1976年10月,我从沈阳军区调入军政大学(后来的国防大学)。不久后,我被调到国防大学马列教研室当教员,开始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到了马列教研室后,我有幸结识了哲学界的老前辈李唯一老师,他热心指导我学习哲学。这段时期,我迸发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感到耽误了太多的学习时间,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学习。1979年下半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进修。得到这个机会,我倍加珍惜,拼了命地学习。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考过了18门课程,北大破格给了我本科同等学力。我记得有一次选修课是美国的政治学教授讲地缘政治。那个年代,我研究的是阶级政治,哪有地缘政治呢?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冲击。

考入中央党校,改革研究真正起步。1984年8月,我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研究生。记得刚入校不到两个月,中央党校召开了一次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研讨会。会上,王珏教授发表演讲,我作为学员代表也作了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后来发言稿在中央党校校刊上发表。会后,王珏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多关注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刚入学不久,我被推选为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开始重点探讨和研究改革问题。从那时开始,我专注于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

文化记忆下老字号的传承与发展

赵 芮

字号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延展。

记忆唤醒是厘清记忆建构机理的重要路径。老字号的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建构本身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一方面,唤醒老字号文化记忆有助于从历时性重新考察文化记忆对传统经验、技艺、理念、模式等的记录、存储与保留方式,以及整个过程的积淀逻辑,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对记忆记录、存储与保留的形式,即记忆承载主体、媒介特点的分析,根据媒介的偏向重新进行媒介选择和媒介组合,实现在文化记忆建构功能方面的创新。另一方面,通过记忆唤醒,可以回溯老字号文化记忆形成中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要素,重点挖掘和思考其在组织和群体层面所发挥的协调功能,实现老字号的文化记忆建构功能的创新。

技术赋能创新老字号的传播模式。通过技术赋能实现老字号文化记忆呈现的场景化。场景作为移动社交时代全新的连接方式,正在作用和改变当前人们的信息生产与接收体验。通过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等具体技术和媒介的应用,可以深度重构文化记忆基本系统——符号系统中的时空、媒介与人的关系,通过用户对老字号产品的生产、工具使用、品牌设计、仪式活动等一系列具体场景的设计,实现老字号文化记忆的具体信息同用户感知的协调与适配,从而带给用户在跨越时空的、即时的、沉浸式的在场体验,以此实现用户对文化记忆感知效果的提升。

运用互联网等社交媒体加大老字号文化记忆传播的力度。据有关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月,全球互联网使用者已达46.6亿,社交媒体活动用户达到42亿。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社会文化记忆记录与呈现由“中心”到“边缘”的权威主导模式,个体的文化记忆记录与呈现正在成为与传统集体、组织、国家同样重要的文化记忆记录形式。虽然相较于集体的文化记忆和组织形式,个体文化记忆的专业性、权威性与统一性略有欠缺,但从另一个层面反而增加了文化记忆记录、呈现与表达的个性化、丰富性与多元性。

此外,社会化媒体独有的“去中心化一再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对于文化记忆的社会化传播具有独特的优势。第一,社会化媒体时代,“记录”与“观看”作为数字时代中重要的文化建构模式,体现出的是个体对于特定社会实践、文化的认知、理解与诠释。个体的广泛参与,延伸了老字号文化记忆记录与传播的触角,让原本遗失、遗忘或者未被发现的独有记忆重新得到挖掘与回归;第二,社会个体和非专业组织的“碎片化”记忆记录模式,可以成为老字号官方或权威形式文化记忆的重要补充,从而实现文化记忆官方记录与民间记录的统一;第三,社会化媒体时代,记录与表达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基本动机。基于此,将老字号文化记忆的传播与社交进行有机结合,既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满足了用户社交的需求,同时由于社交关系的建立,为老字号文化记

的传播又提供了新的传播链与关系链,激发新的传承与传播动能。

文化实践实现老字号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文化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观念形成的基础,也是文化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的关键路径。在老字号文化记忆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实践同样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老字号的文化记忆是其文化实践的重要成果。老字号的文化实践首先表现为继承,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选择与扬弃,形成老字号独特的文化记忆核心价值观;其次则表现为创新,即在生产、消费、交往等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主体的参与,在老字号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以及传播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以此实现文化记忆的扩容。

因此,正是通过文化实践,成功实现了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的统一。老字号的传承本身是一个融合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老字号的文化记忆是对传统的记录、书写与沉淀,追求的是稳定性与延续性;另一方面,老字号文化记忆的唤醒、呈现又赋予了它更多现代性的技术、观念、态度等,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往往孕育着新契机。这种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文化实践形式,始终伴随着老字号的传承与发展,并成为其实现文化延续的独特基因脉络,也成为老字号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作者为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院长】